序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战胜外国武装侵略的伟大胜利。抗战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抗战也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与战时外交也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战争是外交成功的基本保证，没有不屈不挠的抗战就没有外交的成就；同时，外交上的努力与成功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有许多辉煌的篇章。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即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把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争取各国的同情及有利害关系各国的支持；中国利用与德国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德国维持了半年多的中立；同时中国极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从 1938 年到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者，并派遣军事顾问和飞行员来华助战 中国也努力推动美、英(尤其是美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反对两国对日妥协的倾向，使两国逐步确立起制日援华政策，为以后的盟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坚持抗战四年半之后,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从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 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别国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 年 10 月中国代表签字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 月 中、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 年 9、10 月,中国代表参加了大国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 年 4 至 6 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本身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同时，由于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弱国，就其综合国力而言与当时的其他三个大国不能同日而语，其他国家也还没有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因此在战时外交中仍然留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论是成就还是欠缺，它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都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里只想就影响中国战时外交的若干主要因素作些简要的分析。

(一)

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

中国抗战爆发时的国际形势确实是相当险恶的 面对着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欧洲弥漫着对法西斯的绥靖主义，美国沉浸在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之中，西方大国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衰退的阴影。中国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国际社会的反响却软弱无力。尽管如此，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拼死斗争。民族的巨人虽然伤痕累累，但毕竟坚韧不拔地坚持了下来，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使不可一世的日本陷在对华战争的泥潭中，欲进不能，欲退不甘。

抗战之初,国际上对中国能否坚持抗战是没有信心的。许多外

国观察家认为不出二、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苏联在向中国提供援助之先要中国同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因为它担心，中国一旦投降，会跟日本一起反苏反共，用苏联的武器去打苏联。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投入重大兵力,中国军队战败,损失惨重,首都南京也随之陷落。其时外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能够从失败中恢复过来。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接连失守,中国抗战又到严重关头。当时中美两国正在谈判桐油借款。消息传到美国，美国政府对中国是否有决心坚持抗战同样十分怀疑。但是中国抗战同样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

如果把中国抗战与其他国家抵抗法西斯的情况作一对比，也就更能说明问题。1939 年 9 月德国法西斯挑起欧战后，欧洲国家的抵抗在德军的闪电战中纷纷瓦解，德军所向披靡。英法大军先是任随德国扫灭波兰，接着又在德国攻势下连战连溃，德军对西欧的作战仅用 44 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相继沦亡,英军退守本岛。而中国却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与日军进行顽强拼搏，往往一战即持续数月，如淞沪大战就坚持了三个月之久。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军队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连连失利,英国自称为‘不可攻破的堡垒”的新加坡竟也被日军偷袭成功，使丘吉尔也感到“不胜惊异”;“痛苦之至”,而同时,中国却取得第三次长沙作战的胜利，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在缅甸保卫战中，英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只想退守印度，无心认真作战，结果驻缅英军统帅也遭日军围困，中国军队及时前往援救，使包括英军统帅在内的数千英军和盟国人士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中国人民正是凭着自己的英勇抵抗，才改变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屡遭欺凌的软弱形象，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各国的尊敬，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可以断言，没有这种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战斗，外交上的成功是无从谈起的。

说到坚持抗战，又不能不指出，国民政府起来抵抗最初是迫不得已的,它起先的策略是‘以战求和”;“以战促和”,即通过抵抗来

打消日本的投机念头，使其知难而退，回到谈判桌旁。而通过秘密会谈解决中日冲突也一直是日本统治集团中部分人的主张，因此中日间的秘密接触便绵延不断。这些谈判表现了国民政府决策者的摇摆性和抗战不彻底性，但有的谈判也有某种策略上的考虑，如阻挠汪伪政府的出笼，拖延日本对伪政权的承认。甚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时也向盟国抱怨打不下去了，那多半只是对盟国的一种警告和威胁，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政和物资援助。对此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的。

（二）

讲远一点，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战时中国外交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延续和发展。随着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了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羁绊，在国际关系中寻求自己应有地位的斗争。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漫长过程。几代人经过反复的思考与斗争，其间有成功也有挫折，且挫折多于成功。大体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是在外交上结束了以往“始争终让”的行为模式，结束了不断的割地、赔款、丧失利权，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收回利权的过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 20 年代大革命期间中国也在收回权利方面取得若干实际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现了关税自主，并开始与美、英等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问题，这个谈判为“九·一八”事变所打断。此后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情，也为了利用日本与美、英之间的矛盾，没有再提出废约问题。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全世界对中国都刮目相看；反映旧时国家关系的不平

等条约与战时中国与美、英的盟国关系又格格不入，中美、中英修约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修约是从法理上承认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堪称收获季节，以前一个世纪不屈不挠的斗争则是辛勤的耕耘。中国人民长期的反帝爱国斗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三）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制订并贯彻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于中国有利。

抗战之前的十年中，德国在华利益发展迅速，尤其在中国 30 年代建立军事工业和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中，德国作用超过各国。中国政府利用这种关系，竭力使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在战争的头半年中，两国贸易往来照旧，中国对日作战军火的 80% 左右来自德国；德国军事顾问留驻中国。当德国改变对华政策时，中方一再向德方交涉，力求延缓这种改变，不要给中国抗战带来太突然、太大的伤害。德国政策逆转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亲英仇德的姿态，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德国的经贸关系，此后一段时间内仍从德国获得军火供应。

苏联是各大国中唯一与中国和日本都接壤的国家，它的动向对中日双方产生直接的影响。中苏两国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不同的国家。中国政府看到美、英一时不会向中国提供援助，遂确定了联苏制日的战略，并把对苏外交作为初期外交的重点，中苏两国形成了共同对抗日本的阵线，在抗战的头两年多中，苏联是给予中国实际援助最多的国家。即便日苏订立中立条约之后，中国也尽可能维持与苏联的关系，以获取苏联的武器装备。

法国本身受到法西斯德国的直接威胁，在欧洲被捆住了手脚，无暇顾及东方事态，已经谈不上什么远东政策。但在日本封锁了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沿海港口后，印度支那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接受外援的重要通道之一（其余是香港、滇缅公路，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从苏联中亚到中国西北的运输线）。为了讨好日本，法国于 1939 年 9 月宣布禁止任何物资从印支出口，使中国的过境运输发生困难。中国政府与之一再交涉，才使法国答应假道运输一切如旧，实际不予留难。

美、英在东方都有重大利益，但英国受欧洲事态的牵制在远东已处于一种虚弱地位；美国是远东华盛顿体系的倡导者，是列强在远东的首席发言人，而且国力强盛，国民政府在 1938 年就确定了对列强外交以美为主的方针。在争取美国舆论同情、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争取美国财政援助、推动中、美、英等国军事合作等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中国还请美国敦促英国勿对日本妥协。

国民政府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收到了成效，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日的主要国家。但国民政府却把这一方针绝对化了，变成了对美国深深的依赖，反映了一种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弱国政府的心态：总要有一个靠山。它认准了美国的实力及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表示，在战争中，在和平会议上，在战后世界事务中，中国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唯美国马首是瞻。国民政府领导集团无论在战争中还是战后，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维持国内统治地位，都深深有赖于美国的扶植和支持，而大战末期和战后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中的卷入之深是中国一个多世纪对外关系中没有先例的。

国民政府的弱国外交还表现在这两件大事上：在中英新约谈判中，在新界问题上对英国让步；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与苏联签订中苏条约。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个现实：中国还不是一个与其他三大国同一水平上的大国，中国虽已取得大国地位，但还没有取得强国地位。

（四）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在抗战期间，外国与中国的关系或亲或疏，或友或敌，无不以这些国家自身的民族利益为转移。

德国在中国抗战之初采取中立立场，自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因为：一、德国在一次大战后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在中国重建了利益，它不甘心就此放弃这种利益，也不甘心它的地位被苏联取而代之；二、中德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的农矿产品是德国所迫切需要的；三、德国认为日本侵华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这将驱使中国与苏联接近，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共产国际大战略。但毕竟德日两国在瓜分世界成就霸业这个根本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中德关系的逆转是必然的。

苏联支持中国抗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本民族的利益。中苏两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日本侵略中国，使苏联有唇亡齿寒之感。日本一直妄想‘北进’侵犯苏联，也进行了两次‘火力侦察’，苏联对日本企图了如指掌。苏联援华就是要让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陷在中国战场而无暇‘北进’，斯大林也曾坦率地说，中国既是在打自己的仗，也是在打俄国的仗。而苏联的援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那就是不超过日本可以容忍的范围。超过这个限度，把日本惹恼了，就又不符合苏联利益了。所以，国民政府要求苏联直接出兵自然是过高的奢望。到了 1940 年下半年情况又有了变化。日本这时已决心改行‘南进’方针，苏联已察觉到德国即将进攻，为了消除来自东方的威胁，便开始与日本进行磋商，结果于 1941 年 4 月达成中立条约，苏日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妥协，直接的受害者则是中国。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是以直接的民族利益为根据的。

美、英两国的对华政策也莫不受其本国利益的支配。美、英两国都是在西太平洋和东亚有重大利益的国家，而日本却公然反对

门户开放政策,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并自命为这种“新秩序”的领袖,毫不掩饰要把英、美利益扫地出门的野心。美、英两国的有识之士逐渐领悟到，中国既是在为自己而战，也是在为他们而战，只有日本的失败才能把美、英从危及他们在远东的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因此不能眼看中国的牺牲而无动于衷；他们进而认识到，面对日本的侵略，声明和宣言已无济于事，唯一有效的是物质的抵抗，两国这才开始迈出了制日援华的步伐。确定了这个方针后，它们便常常在中国抗战可能发生动摇时宣布制日援华措施：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商约，是在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签字后两天(1939 年 7 月 26 日)宣布华锡借款,正是汪伪傀儡政权出笼之时(1940 年 3 月)日本派兵进驻印支(1940 年 9 月 23 日)后两天,美国宣布了钨砂借款的消息，并对日本彻底禁运废钢铁；罗斯福赶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发表当天(1940 年 11 月 30 日)发表财政援华声明,英国政府也采取类似行动。这些措施都表示，它们对中国抗战与本国利益的关系看得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重视了。

在修约和中国大国地位问题上,美、英两国的不同态度也是它们不同利益的反映。英国决策者念念不忘战后恢复其殖民帝国，恢复其在远东的利益。他们同意与中国修约是很勉强的，而且认为，如果美、英放弃同样多的在华特权，实际上英国损失的利益比美国大，因为战前英国在华的实业利益大于除日本外的任何大国。因此英国在修约时力图保留若干特权，如经营商业的最惠国待遇、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购置不动产权，并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了反复的交涉。更不要说它坚持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了。

美国不顾英国和苏联的不满和反对，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形象，同样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决策者意识到战后世界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老的殖民帝国将寿终正寝，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将是不可避免的，战后世界将在这些大国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秩序，而美国应当是这种世

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在亚洲，美国旨在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和平”，希望把中国包括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在这里的主要合作伙伴，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因此提高中国的地位也就是美国的本身利益所在。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抗战期间，美国为了使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致因中国内耗而削弱，采取扶蒋容共抗日的政策，但美国决策者对国共关系是很担心的。一则，中共在抗战中得到的大发展使它已经有实力与国民党进行权力角逐；二则，国共两党抗战时期勉强得以维持关系，但毕竟两党之间矛盾太深，一旦日本侵略这个压倒一切的因素消失，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丧失，两党之间的内战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三则，国共两党的内战极可能把美国和苏联都牵扯进去，两大国将不得不分别支持内战的一方，这样不但使美国决策者以中国作为亚洲主要稳定因素的希望落空，而且会使在大国合作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秩序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决策者希望国共双方在战时就携起手来。但国共双方的立场却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样美国就必须作出抉择。既然美国决策者已经对国民政府领导集团作出了巨大投资，并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它也就只能支持国民政府，而不能支持中共，尽管这不是它最佳的选择。

（五）

从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还可以看出外交与内政的密切关系。

两个互相平行的政权的存在是抗战时期中国内政的一个主要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与国民政府对立的苏维埃政府是取消了，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它们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国共之间又摩擦不断。以战时外交的情况看，合作无疑有利于外

交的开展，分裂对外交则是一种制约。

国共合作使中国容易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正是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苏联可以在抗战前期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搁在一边，放手地援助国民政府。这种援助是给予中央政府的，但它是用来抗日的，因此与中共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中共也明白表示，中共不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只要这种援助是于抗日有利的。

分裂制约外交的一个例子是中苏条约谈判。诚然，这个条约是以雅尔塔协定为蓝本的，国民政府签订条约有被迫的一面；但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让与苏联权益，换取苏联在国共之争中支持国民政府，孤立中共。苏联看准了国民政府有求于它，谈判中态度强硬。它作出了苏联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的承诺，与国民政府达成一桩有予有取的交易。至于以后如何执行，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内政影响外交，外交反过来也影响内政。

外国影响有利国共合作的显著例子是各国对皖南事变的态度。皖南事变后，美、英、苏表示了对事变的关注，希望国共团结抗日，不发生内部分裂，罗斯福的特使还专门带来了总统口信。某种程度上是在国外压力下，蒋介石表示中国决无发生内部冲突危险，中共问题是一政治问题。此后美国继续关注国共联合抗日的问题。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史迪威都一再表示对中国内部团结的关注，甚至建议撤销对陕北中共根据地的围困，调被围八路军上抗日前线。这些表态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一定的作用。

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外国影响主要是国民政府领导集团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美国在抗战末期对华政策的转变。对这种特殊关系，中共自然看得一清二楚。这既是一个可以利用，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美国如果施加影响，要求战后中国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这种影响便对中共有利；而反过来，由于美国离不开国民政府，因此如果国民政

府决心打内战，决心削弱乃至消灭中共，美国予以支持，那末形势对于中共又将变得十分不利。中共在重庆建立代表团，这使它有可能与美国官方人士（外交官和军事人员）进行接触。中共代表在这方面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许多美国外交官和军事人员都对中共得出了颇好的印象。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更是中共争取美国同情的一个成果。但如上所说，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由美国自身利益决定的，美国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无疑只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国共之间的分裂。

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了。这场使中国获得新生的战争已经作为光辉的篇章记载在我们的史册上，但作为历史研究的课题，这是个值得长久发掘的富矿。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历史画面之丰富多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诸多联系。五十年前联合国的成立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是那时取得的；当时未能解决的香港问题终于将在1997年得到彻底解决。这场50年前的战争也还给我们遗留下种种问题。外交与战争不同，这里没有硝烟和枪炮声，但这是战争期间的外交，外交上取得的任何胜利和进展都是以人民和军人的奋斗和牺牲为依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笔者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和受难的同胞的一个纪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言

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的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在远东拉开了武力侵略的序幕。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了柳条湖炸路事件，随即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数月之内，日本便侵占了东北三省，以赤裸裸的武力把中国东北置于其刺刀统治之下。

日本此举是对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它向列强表明，日本已决心破坏这一体系，背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把中国作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发出了要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信号。对于日本的这一公然挑战行为，国际社会没有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基本上是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默认了日本的侵略。美国发布了一个不承认主义的原则声明，国际联盟通过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日本撤兵劝告案，这些远不足以制止日本的侵略，而日本则以悍然退出国联作为回答。“九·一八事变”标志着远东地区华盛顿体系崩溃的开始。它还表明，西方列强既没有实力也没有坚强的意志来维护这一体系。

这以后，日本不断向华北地区进行新的侵略扩张，并于1934年4月发表了针对西方列强的“天羽声明”。日本声称它与中国有特殊关系，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维护东亚的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的责任，无须它国干涉，并扬言如果它国暗助中国，日本不能置之不理。这一声明公开暴露了日本要独霸中国和东亚而不容其它列强插手的野心。为了取得与英美相抗衡的力量，日本急于摆脱华盛顿裁军条约对于日本海军的限制，该条约规定英、美、日海军所拥有的战舰吨位比例为5∶5∶3。日本希望能放手发展其海军力量。1934年底，日本正式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6年1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在日本于东方发难的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在西方向凡尔赛体系频频发起冲击。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新秩序的口号以否定凡尔赛体系。对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的冲击，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现存世界秩序进行挑战的互相呼应的局面。同时，德意日在主观上也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进一步配合将有利于各自在东西方的扩张。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的旗帜下结成伙伴关系。意大利于次年加入。

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与接近，促成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另一变化，这就是以防范德意日为主要目的的其它大国的日益靠拢。作为现存世界秩序主要设计者和维护者的英美法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改善。1933年,一直对苏联持敌视态度的美国终于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在东方，为了限制日益扩张的日本势力，英美法开始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协助中国从事增强国力的建设活动。但是西方国家这时都忙于克服经济危机对本国带来的灾难，它们对东方事态的关注是极其有限的。苏联对日本的扩张也怀有高度的警惕，它在不断增强其远东军备的同时，迈开了与中国改善国家关系的步伐。

这就是中日战争爆发前的远东及国际形势：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应，这一反应对中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由于德意在西方的行动，英美等列强对日反应能力又受到削弱。这两个因素，都将对日后远东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也迫使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变化。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侵略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抵抗，而在总体上奉行的是委屈求全、忍让求和的政策,先后与日本达成了“塘沽协定”、“何梅协议”、“秦土协定”等妥协性协议。然而,这种妥协态度虽然平息了一时的事态，但它并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增大的胃口，又激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和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日本的步步紧逼已严重

地威胁着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有效统治，把它逐步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国民政府开始在各方面作万不得已时起而抗战的准备。

在进行各种国防准备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外交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政府企图借助英、美、苏的力量以制约日本，因而在外交上日益向其靠拢。国民政府暂缓推行它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所倡导的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外交”，注意加强与英美的联系。共同的需要，使中国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日见密切。1933 年，中美达成数额为 5000 万美元的“棉麦贷款”协议。1935 年，英国协助中国整顿金融，实行“币制改革”。1936 年 5 月，中美缔结购售白银协定，以稳定中国法币。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得以改善。两国于 1932 年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以后，双方就有关两国及远东的安全问题多次进行秘密磋商。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长足发展，双方在军事及经济领域的联系尤为密切。中国政府进行的这些外交活动，为抗战爆发后世界各主要大国对中国的道义和物资支持打下了基础。

在对日方针上，国民政府给自己确定了不可再退让的最后界限。1935 年 11 月 15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蒋介石指出目前救国建国的唯一方针是“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倘以忍耐而求和平无望，则应“下最后之决心”[①]。对于这“最后关头”的具体限度，蒋介石于 1936 年 7 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说明：“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说得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

①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13 集，台北 1984 年版，第 522—523 页。

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 11 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遇有领土主权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略，就是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①

然而，日本无视中国民众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和中国政府再难退让这一现实，仍在做着征服中国的美梦，仍在继续进行着侵略中国的各种活动以及更大规模的侵略的准备。1937 年 3 月上旬，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佐三人奉召回东京参谋本部汇报中国的现地形势。作为日本在华三大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可以说反映了在华日军的普遍情绪。他们的报告认为：不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中国政府都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元化。因此，“不论在任何场合，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地形势逐步恶化”。他们认为，用一般的手段已不可能调整好如此恶化的日华关系。从对苏战略考虑，他们主张用紧急手段来调整日华关系。其办法之一就是“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②。

关东军积极主张对华用兵。它在 1937 年 6 月 9 日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一份意见书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认为 如为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最为上策。’意见书认为，南京政府‘对于日本所希望的调整邦交一事，丝毫没有作出反应的意思，如我方对它进而要求亲善，从它的民族性来看，反而会增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③。

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14 集，第 38 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资料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北京 1986 年版，第 8 页。

③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 1961 年版，第 333 页。

华北是中日矛盾的聚焦点。它既是日本对华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中国政府不可再退让的第一块阵地。日本加紧进行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各种活动，并不断向华北增派兵力。日本华北驻屯军从原来的 2200 多人激增到 6000 多人,扩编成第四混成旅团。驻屯军司令官亦升格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其地位与关东军司令官平级。日军还扩大在华北的驻兵区域，并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尤其是那些临近中国军队驻地的演习，极具引发中日两军冲突的危险性，从而使华北局势更趋紧张。在日本毫无节制的扩张活动下，整个华北弥漫着一股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紧张气氛。

第 一 章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第一节 从华北交涉到淞沪抗战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是北平通往南方的一个重要交通要点，平汉、津浦等铁路干线皆经过于此，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1937年7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非法夜间演习，声称一士兵失踪和受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拒绝后，悍然向宛平县城发动攻击。驻守该城的中国陆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所部官兵奋起抵抗，由此爆发了日后载入史册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件本系一地方冲突事件，但日本军队蓄意扩大事态。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县城，并于9日、10日多次向中国军队发起挑衅性的进攻。7月11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颠倒是非，声称华北事变“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因此“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取得适当的保证。”显然，日本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对事件本身的解决，而志在谋取对华北更广泛的控制权。为此，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①]。

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件予以高度重视。事件发生时，蒋介石等中央政要正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7月8日，蒋介石闻讯后即预

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1955年版，第366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